

## 吕振羽的治史道路\*

叶桂生 刘茂林

吕振羽同志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研究他几十年走过的革命和治学道路，对于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和青年朋友有着借鉴意义；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学史研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在这里，我们根据了解的情况，试从这方面作一初步的探索，更多的是铺陈素材，供专家和读者们参考。至于对吕振羽史学著作及其思想、观点的研究和评述，非本篇所能胜任，容当另文后续。

### 一

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日（己亥年腊月三十日），吕振羽出生在湖南省邵阳县（旧属武岗县）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曾祖辈是贫苦的农户，到祖父时，才成为自耕农。父亲在农村教书。吕振羽自幼勤学奋进。辛亥革命发生那年，振羽刚十岁，他毅然剪去了头上的辫子。十三岁，他在当地玉公山坊吕静斋先生经馆就读时，曾作《咏榴花》五绝一首。诗云：“门内榴花树，花开血样红。何时成硕果？此日莫摇风”。他寄情于榴花，赞美她的艳丽及其刚烈的性格，并借对累累硕果的追求，透露出胸中的不凡抱

---

\* 我们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得到江明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特表谢忱。

——笔者

负。吕静斋将诗改成：“种得榴花树，初开艳色红。何时能照眼，此日已摇风。”表达了对这位门生的钟爱和期待。

进中学后，吕振羽又很受国文教员萧石人的器重。萧是一位新派人物，曾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僚，后辞职回乡教学。在萧的引导和影响下，他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大量作品，为之倾倒，成了社会改良主义和这班改革志士的崇信者。有一次，他为答《策问》题写了一篇短文。意思说，他立志终生救国安民，不图功名利禄；如国泰民安，暮年有茅屋两间，得以卧读唐诗足矣；倘若国不得救，民不能安，他即拜告祖宗，与恶势力拼杀，血溅沙场，见轩辕于地下。萧赞赏他这种誓比汪锜的志向和气概，在文后批道：“圣贤行止，豪杰义烈，兼而有之。”吕十八岁那年，伟大的“五四”运动波及到武岗。他联络自己所在的第五中学及县师等几个学校，组织“学生联合会”，奋起响应。他们集会演说，游行示威，开展“反日仇货”运动。小小的武岗山城一时风起云涌。吕被推为学联的会长，俨然是这群血气方刚、见义勇为的青年的小领袖。

一九二一年，吕振羽考进长沙市的湖南工业专门学校（不久改为湖南大学工科），专攻电机，以实践“工业救国”的理想。在湖大，他团结了武岗县东部四个区的同学，组成“东四区学会”。吕参照从同学欧阳骏处借到的一本名叫《极乐国》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亲手起草了学会的《旨趣书》。在那里面，他提出要在乡村组织农友们互助的“共耕社”；开办木、石、瓦、竹匠合营的“平民工厂”；建设一个没有剥削、人人饱暖的“极乐国”。他们宣称，用这样的方案去改造东四区，改造武岗县，改造湖南省，乃至改造全中国、全世界。次年冬季，湖大停课，吕振羽邀约会员们回乡，在金秤市古峰学校召开大会，决议推举校长人选，接办古峰学校；选出清算委员会，向区团防局清算历年

团防局经费和预征田赋。结果当地豪绅区董喻炳莲密告武岗县衙门，诬他通匪。团防局要逮捕他。昏暗的除夕之夜，冒着寒气袭人的阵阵朔风，吕振羽在父亲和祖父的催促下，离开了家乡。从此，“东四区学会”被摧垮，“改造”社会的计划化为泡影。回到湖大后，又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吕振羽。原来，教他们电机工程的老师赵师梅，是一个人称博学多识的留美博士。一次，学校的一台电机坏了，找他去修，他却束手无策。振羽想，追随这样的“洋博士”，能学到什么呢？“工业救国”焉能奏效？他怀疑了。正在他徘徊、犹豫之际，毛泽东、李达等同志在长沙办起自修大学，讲习革命救国的新道理。这时，他参加了“驱宾运动”（驱逐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学阀宾步程），被推为驱宾大会副主席，与当时湖南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夏明翰时有接触。夏明翰指点他，去湖大法科听李达同志的课——《新社会学》。自此，青年时代的吕振羽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启蒙教育。同时，他带着极大的兴趣研读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吕振羽立即投身革命，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军打到长沙。刚刚由湖大结业的吕振羽便投笔从戎，随军到了江西。次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时局的逆转，又使吕振羽陷入苦闷、迷惘、徬徨之中。一九二八年秋，他自上海乘船北上，抵北平。在风雨凄迷之夜，吕振羽触景伤怀，面对祖国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发出了深深的感叹。

出路在哪里？他看到隐蔽在各派新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明争暗夺，痛感眼前中国的“重大问题”是“在求民族的生存”。<sup>①</sup>

---

<sup>①</sup>凡有引号而未注明出处者，均吕振羽本人著作。见《中国外交问题》。

而国民党政府正与帝国主义各国修订条约，实质是继续承认过去列强在中国的权益。吕为此写成《中国外交问题》<sup>①</sup>一书，加以评论。在书里，吕振羽提出要“组织世界弱小民族国际”，“与西方无产阶级同盟”，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国内，“完成政治民主”，建设“乡村自治”，“改良教育制度”，“发扬民族文化”等等。无庸讳言，这时的吕振羽，对新上台的国民党政府还抱有幻想，主张取“积极监督”态度；同时，又惑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宣传，对中国共产党还保持距离。

一九三〇年一月，吕和在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郑侃、杨续（后名杨刚）、刘穆（即刘思慕）等几个志趣相投的青年学者，创办起《新东方》月刊。十月，成立“东方问题研究会”。月刊和研究会以探索解放东方弱小民族，谋求独立自强为己任。这时，吕振羽幻想创造一个新的主义，建立一个新的政党。他发表在《新东方》第一、二、三期的那篇“纵横十万里，上下五千年”的长文——《障碍问题》，就是这种企求第三条道路的剖白。此后，吕还发表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署名晨光）、《东方民族与东方革命》（署名何民魂）等文章。在当时的条件下，《新东方》的进步性是明显的。它与东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进步刊物时有交换，影响不断扩大。一九三一年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方觉慧由南京到北平，企图控制和利用《新东方》的出版，胁迫研究会南迁。这一当头棒喝，粉碎了吕希求不偏不倚，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东方问题研究会”理事郑侃、宋斐如、谭丕漠、邓梅羹等人以吕振羽为首为使这个组织和杂志不被国民党所控制和利用，坚持解散学会，停止出刊，并发表了抗议《宣言》（吕振羽起草《宣言》，郑侃、杨刚译成英文）。吕从此便离开了《新

<sup>①</sup>吕振羽著《中国外交问题》《村治月刊社丛书之一》一九二九年六月 京城印书局出版。

东方》。国民党政府的这一举动并不是孤立的。自一九三〇年以来，它为了配合军事上对共产党领导下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在文化方面也加剧了对进步学者的迫害，强化其反动的思想统制政策。蒋介石就公开叫嚣：“青年的思想，须赖三民主义以统一之。”其实，蒋介石早已背叛了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是要人们“统一”于他的卖国、独裁的法西斯主义。在这种专制主义淫威的笼罩下，哪里还有“新的主义”的立足之地呢！严酷的现实教育了吕振羽，使他认识到所谓“独立”的学术救国也是行不通的。要想使自己的学识真正有益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自强，就应该把同情心和立脚点移到中国共产党人所代表的革命派一边来。从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开始，世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爆发了经济危机。这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帝国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必然灭亡的论断是无比正确的。从而，大大激发了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学习兴趣。在那些日子里，他昼夜不分，手不释卷，贪婪地阅读着《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及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卢森堡的《新经济学》、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等书；并和郑侃、杨刚、谭丕漠、宋斐如、穆雨君、邓梅葵（翦伯赞后来也加入，一九三八年由吕介绍入党）等创办了一个“青年出版合作社”，计划每年译著十部马列主义的书稿。由于严酷的现实的教育，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影响，与同志间的有益交往，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这时，吕振羽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使他逐渐从一个朴素的爱国者提高为一名无产阶级的理论战士。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了他进行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这两句诗，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做吕振羽早年历程的写照。

## 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其第一步就是从对社会物质生活的探索，也即从经济问题入手的。

“九·一八”后，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日侵蒋暴痛离支”的现实，吕振羽奋笔疾书，以战斗的姿态从事著述。一九三二年二月，他写成《中日问题批判》一书，起初在社会上演讲，反响很大；后由清华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张凤阁（烈士，抗战初党派赴山西新军工作，曾任旅政治委员，在阎锡山反革命的“十二月政变”中牺牲）推荐，交“导群书店”出版发行。“导群”在介绍中指出：“在现在，中日问题已经是一个严重的复杂的而不易解决的问题了，而本书却能站在唯物的观点，用辩证法从经济基础上去把握它。不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与其侵略中国的动因作一精确的观察，就是对于中国现在一般的意见，也加以严厉的批判。”吕振羽认为：“此次中日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中国各阶级各政党的政论家，却很少肯从历史和经济的观点去解释……”他不同意仅仅从日本军阀的侵略行为及其对外扩张政策去分析中日问题的实质，那样的话，“始终都不能找着问题的核心所在。”在吕看来，“市场的再分割，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继续不断的事实。中日问题因之在市场再分割的形势之下而开展出来。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本质地对立

的，互相排斥的。……满洲又是资本主义各国视为反俄的东方防御线。因此，中日问题的意义，又含了一个反俄的重要内容。”吕振羽的这一分析，不仅深刻地揭示日本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外实行侵略扩张的最终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日问题的实质；而且，在实际上，还从整个世界革命角度，预示即将发生在中国的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国际意义。

在《中日问题批判》中，吕还痛诋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政策，指出：“中国的政权，乃是由帝国主义者通过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的一种双重式的政权，所以，封建军阀和买办阶级自始只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不是和帝国主义对立的，所以他们并没有反帝国主义的可能，这完全是半殖民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性。他们不断去向国联申诉，其意义并不是在对日本的反攻，而是极其无耻可怜地是在一个主人跟前受了委屈，转去向多个主人鸣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竭力扼杀奋起抗日的东北义勇军，一味地对日妥协、退让，致使我东北三省在三个月内全部沦丧。第二年的“一·二八”，日寇又进犯上海。又是国民党政府迫令抵抗日寇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并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一手破坏了正在形成的人民抗战的形势。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抗日反蒋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各地掀起。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在人民怒涛的冲击下，发生了危机。为此，南京国民党政府一面演出蒋介石再度下野的丑剧，一面又向美帝和国联呼救，制造假象，欺骗群众。然而，事实正象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宋庆龄、何香凝等一千多位爱国进步人士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说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的痛苦的实际经验当中，已经深

刻的觉悟到：要想依靠国民党政府来抗日救国已经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事了。要想使美国或国际联盟方面来帮助反对日本，也只是一种幼稚的蠢笨的思想。”吕振羽在书中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的剖析和揭暴，无疑是说出了人民的心声，帮助了人们提高认识。同三年前出版的《中国外交问题》相比，作者的立场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作为一位先进阶级的思想代表，其理论研究工作的革命性和战斗性。《中日问题批判》的刊行，激怒了国民党政府。一九三三年二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将该书列入“共产党书刊”，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命令全国查禁。

《中日问题批判》脱稿后，吕振羽又着手修改一九二九年开始写的《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一书。这时，他愈益迫切地感觉到，必须揭破帝国主义包括日寇强大的神话，教育人民不但要仇视它，而且要藐视它，坚定地树立起我们民族必胜的信心。他为这本书规定的任务是：“帮助大众去了解资本主义经济之这个阶段（即一九二九年后的经济危机——笔者）的发展过程，而理解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在书中，他汇集了大量的资料，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了细致的分析。他指出，正是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造成了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对外侵略，世界面临第二次大战的危险。同时，他也明确地告诉人们，帝国主义自身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日益加深的危机又必然加速它走向灭亡的途程。这样，吕振羽就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的论断结合实际，并加以具体化了。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最近世界之资本主义经济（上）》脱稿付印。七月，封面绘有铁锤镰刀图案的这本书正式问世。“北平书局”的介绍说：“本书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应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内容丰富，材料正确。”

《最近世界之资本主义经济》出版后不久，也遭查禁。但，它的销路却愈广，不少书摊私自翻印，读者竞相传阅。这部书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得到称许。直至一九六二年，经济学家吴大琨在一封信里还指出，吕振羽是搞世界经济这门学问的前辈，“振羽同志在三十年前研究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时，就不但从生产、贸易、金融、劳动失业等方面去观察世界经济恐慌，而且还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以及印度、加拿大等国的具体经济情况出发观察世界经济恐慌，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启发。”

此外，在这期间，吕还写了《资本主义没落期的东方革命的意义》、《中国国民经济的趋势之推测》、《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等论文。一九三三年春，经李达同志的引荐介绍，吕振羽在中国学院（即后来的中国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经济史》、《农业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等课程。这年下半年升任教授，时年三十三岁。在中国大学内部，两种势力的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学校的领导权为国民党右派把持，时常对进步学者进行排挤、迫害。一批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托派分子又相当活跃。吕振羽在学校里是进步力量的中坚之一，他和李达、黄松龄被称作“红色教授”。一九三四年春，吕协助学校国学系主任吴承仕编辑《文史》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不久，该刊被查禁，罪名是“有阶级斗争意识”，据吴承仕说，就因吕文之故。当时，吕振羽曾写诗记下那种“门前追迹有鹰雕”的险恶处境，以及生活和思想状况。诗曰：

古木穰荫掩小楼，筐中禁帙点圈稠。  
疾世总嫌人喋喋，夜眠时惕鬼啾啾；  
邻居相护多贫乏，灶下常愁缺米油。  
事业等闲付逝水，情怀岁岁系神州。

吕振羽对于经济学理论，以及世界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为他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也决定了，此后一当把研究的重点转向历史学，他就能从根本上摆脱一切旧史学传统的束缚，自觉地加入“五四”以来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行列。在尔后丰富的历史学著述中，他之所以能游刃有余，做到有所创见，自然是与他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分不开的。

### 三

吕振羽的历史著述发端于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其开山之作就是《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随着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建立，白色恐怖日益加剧，思想文化界加速了阶级分化。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国情怎么样，中国将走向哪里等一系列至关重大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一辩论的深入，又诱导人们去对过往的社会作规律性的探索。于是，中国社会史的问题，遂为各阶级各党派的学者所关注。

一九三〇年，避居日本的郭沫若同志的历史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国内出版发行。郭在书中，通过分析和研究大量甲骨文、金文等历史资料，阐述了自殷周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一次作出了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等阶段的判断，从而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论述完全适用于中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公开发行，在学术界，乃至社会上，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尽管书中的一些论说“在材料的鉴别上每每沿用旧说，没有把时代性划分

清楚，因而夹杂了许多错误而且混沌”<sup>①</sup>；但是，郭沫若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sup>②</sup>《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遭到学术界传统势力的白眼和反对，尤其是那帮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伪装起来的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学者和托派分子，诸如陶希圣、胡秋原、李季、严灵峰、王宜昌和叶青等人的肆意攻击。一九三二和一九三三两年，他们以《读书杂志》为阵地而喧嚣一时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就是在声斥和讨伐郭沫若的鼓噪中开场的。

“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包括“（一）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什么？中国曾否出现过这样的时代？（二）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奴隶社会与希腊、罗马社会是否完全相同？（三）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及其没落是怎样？”<sup>③</sup>这些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历史的本质特征，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它们“抓住了各种社会集团”，又“冲破了国界”，“在中国，在日本，在苏联，青年人，老年人，实际家，理论家，都曾有过很热烈的争论。”<sup>④</sup>“论战”是意识形态领域内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一场较量；同时，也包含了无产阶级史学队伍内部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争辩，情况错综复杂。

“论战”的高潮时期，吕振羽同志正从事经济学的著述和教学，然而，“论战”中提出问题的尖锐性和现实感却深深地吸引住他，驱使他去投入这场斗争。这正象他自己说的：“我之来参加中国社会史研究和论争的动机，完全由于感觉这一问题很重要，已迫切的需要解决。其次，深深的感觉一般中国史研究者——”

---

①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后记。

②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九三七年生活书店初版。

③同②

④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九三七年生活书店初版。

尤其是那些冒充‘辩证论’的‘历史家’们——大多不是如实地在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便又陷入了机械论的歧途。结果虽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不曾替我们解决了问题。对历史事实的混淆颠倒，徒然又替中国史蒙上一层新面具。因此使我不能不冒险来尝试。”于是，他反复认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稽查各家各派论点的是非曲直，进行条分缕析，独立思考。他尤其摒弃在“论战”的唇枪舌剑中那种崇尚空谈的学风，尽量详细地占有资料（包括出土的文物和文献记载、传说），终于形成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史发展的系统见解。就在“论战”的高潮过去，学术界显得沉寂的那段日子里，吕振羽正日夜奋战，履行他的历史研究的计划：撰写一部《中国社会史纲》，按社会发展阶段分四册，第一册专论“无人过问”的殷周以前的中国远古社会。果然，一九三四年七月，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经李达校阅、作序并推荐，交北平的“人文出版社”印行问世了。

吕在《自序》中交代了写书的目的：“第一只在给无人过问的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引起大家来研究；第二只在说明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世界史的其他部分比较，自始就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而是完全有其同一的过程。”在书里，吕十分赞许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理论倾向，指出：“郭沫若先生说得好，‘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所以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不啻是我们解剖中国社会的唯一武器，是唯一正确的历史学方法论。在阐述许多具体问题时，他还不止一次地称赞郭沫若的“科学创见”，其中有的问题，还自认“承袭郭先生的意见”而有所发挥。同时，他严正地回击了各个反动派别的学者，特别是“冒牌的唯物论者”对于历史唯物论的褻瀆。他说：“象胡适，他从美国布尔乔亚学者那里抄来一些

术语，从所谓实验主义出发，把其所谓《中国哲学史》粉饰一段之后，便无法再继续下去。象李季，不论他是否居心想创造历史发展法则的新理论，但是，因为其一定的立场限定他对历史唯物论的隔阂，使他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所作的结论，不能不陷于机械论的公式主义的谬误。象陶希圣，他似乎在企图重新创造一历史发展法则的各别性——多元性的理论，结果不惟对中国历史的真实性不曾把握着，且使其自己的研究，辗转于历史循环论的泥沼中，在儒家所划定的圈子中淌来淌去。虽然陶希圣自认已跳出儒家的骗局。”由此可见，在两军对垒的中国社会史论争中，吕振羽同志所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是鲜明的。当然，通过对所掌握资料的认真分析和研究，吕对于郭沫若的某些具体论点又不拘苟同，在书中每每加以辩论。但正如一九六一年他本人说的那样，“这是属于自己阵营内的‘争鸣’的性质，属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性质。”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对于“论战”中提出的主要问题都有所涉及。作者批判了从苏联学者波格达诺夫那里抄来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和马扎亚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指出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不仅在“理论的范畴里”是一种错误，而且，“在政治上包含着一种极大的危险性”，即取消了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封建任务。他也批判了那种认为中国社会特殊，不曾经过奴隶制的偏见，正确地提出中国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和现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等四阶段。

当然，该书的主要部分是作者对殷商以前远古社会的分析。这完全是一次拓荒性的工作。事实上，自“五四”以来，学术界研究中国历史的，大抵都只从殷代开始。“疑古”的“国故”先生们宣称把中国古史缩短二三十年，从“‘诗三百首’做起”，也就是说东周以前无史；就是郭沫若的巨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曾断言：“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起头。”对于殷商以前时代

历来有着悠久的传说，并有不少地下出土器物的发现，可是，关于它的全貌，人们仍是不予问津。科学无禁区，人们要透彻地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那比之阶级社会不知长多少倍的无阶级社会的秘密，就必须有勇气冲破传统成见的束缚，去“作一次探险的尝试”。吕振羽正是这样做了。他对读者声明：“如果我所采取的航路错误了，由我个人负责，如果将来事实的发现，万一能符合了我的尝试的结果，那就更能证明历史唯物论的正确。”在书中，他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卢森堡的《经济学入门》等著作，并依据仰韶各期的出土器物为主要史料，其他古籍、神话传说、民间习俗为副料，探求出中国史前期社会的一般特征，确定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传说中的夏代是“父系本位的氏族社会”，并对各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婚姻关系和社会制度，以及两个时代之间的转化，都作了具体的考察。在驾驭史料上，他注意运用出土遗物所指示的物质生活关系去解释文献古籍中的神话传说，驳斥了从来的儒士在这些问题上的无稽奇谈。总之，《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从严谨地应用方法论和慎重地搜集史料两个方面，填补了学术界对于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空白，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虽然，由于条件的限制，其成果还是粗略的。翦伯赞同志在一九三八年是这样来评价《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的社会意义的，他说：“吕振羽的这一大胆的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在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sup>①</sup>

<sup>①</sup>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一九三九年新中国书店发行。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出版，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为之欢呼、赞扬者有之，为之顿足、讥评者也有之<sup>①</sup>。对于这一切，几十年的历史已经作出了公允的评断。今天，值得我们特别称道的，还是吕振羽自从事历史研究伊始，就具有一种不畏艰难，勇于作“探险的尝试”，开辟草莱，闯出新路的精神。他自己在一首《喜〈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出版》诗中曾说：

抨谬批邪奋铁笔，筭路蓝缕探道崎。  
丹心异代应知我，非贪史社一枝栖。

吕振羽往后在史学这一杂芜丛生的荒原里披荆斩棘，不断创新，靠的就是一颗“丹心”，以及“抨谬批邪”和“筭路蓝缕”的奋斗精神。这也可以说是吕振羽一生治史的一个特色。

《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脱手后，吕又着手对殷周社会的探讨，先后在《河南政治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经济学报》等杂志上，发表《殷代奴隶制度研究》、《关于殷代史料问题》、《西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殷代经济首论》和《周人国家创设的过程》等文章。一九三四年底，他的《中国社会史纲》第二册，即《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完稿，后因出版上的辗转周折，迟至一九三六年才由南京“文化印刷社”和上海“不二书店”分别印行。

关于殷代社会的性质，当时的学术界众说纷纭。陶希圣任意穿凿臆断，一会儿说是氏族社会，一会儿说是封建社会，一会儿又说成是“氏族及原始封建时代”；叶青也说是氏族社会；李季

---

<sup>①</sup>值得一提的是，这时任中国大学“讲师”的陈伯达，与托派叶青等人沆瀣一气，胡诌中国不曾有过奴隶制社会。一九三五年五月，陈在《太白》杂志第二卷第四期发表《殷周社会考略》一文，攻击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的有关观点，说吕是什么“历史原理论者”。

则说是“亚细亚生产方法”的时代；陈伯达也说是“原始封建社会”。另外，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殷代是“一个原始公社制的氏族社会，至少应该是这种社会的末期。”在这种情况下，吕振羽对各家的意见，既不简单地鄙薄否定，也不轻易地随和盲从，而是作了详细的研究。他重新搜集和解释资料，尤其吸取近期发掘殷墟遗物的成果，得出了独立的见解：殷代是中国奴隶社会。

和撰述史前期中国社会史一样，吕十分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要想正确的认识一个时代的社会的本质，阐明其发展规律，必须从其运动的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适应和制约的总和等方面，作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考察。易言之，只有从现象的全体的内在联结上，从其发展变化的运动的根基上等方面，去阐明其独特的形态和规律。”而象陶希圣、叶青这些乔装的“历史家”，却是把社会现象从相互联系中抽出来作孤立的观察，把本来在运动的因素当着静止、僵死的东西去排列，或是摭拾一两条材料，故意加以夸张，把残余的说成主要，以局部概括全体，无可避免地都陷入实验主义和机械论的泥坑。在陶、叶这些人看来，研究工作似乎不用“对科学对群众负何种责任，而只须对其主子负担反对科学欺骗群众的责任。所以他们便只须在御制的结论下面，用一些零片的、断章取义的材料去粉糊，便算完成了任务。”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期间，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一批所谓的文人学者对历史发生了异常的兴趣。他们并未对中国历史作过认真的研究，而“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从实际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sup>①</sup>”，从而一种经院派的空谈学风盛行一时。吕振羽这里对陶

---

<sup>①</sup>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一九三九年新中国书店发行。

希圣等人的揭发和批判正是针砭时弊和切中要害的。这无疑也表明了他本人对于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的追求。另外，在该书初版跋中，吕对于陈伯达的攻击，也给了坚决的回击。<sup>①</sup>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和性质的主要力量是生产方式，而“生产的变更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上，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上开始的。”<sup>②</sup>根据社会生产力，首先是生产工具的状况来辨别一个社会的性质，是三十年代初新史学工作者的一般方法。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铁器的发明和运用，是国家也即奴隶制出现的前提。恩格斯肯定了摩尔根的说法，认为人类社会“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纪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sup>③</sup>殷代未曾发现有铁器的大量使用，而且从出土遗物看，还有石器。那么，能不能就可由此断定，殷代未进入阶级社会，尚处在氏族公社阶段呢？吕振羽要突破殷代“氏族社会”论，势必就面对这样的问题：究竟怎样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恩格斯的上述论断，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吕振羽在学术研究中，提倡和力求做到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國历史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首先，吕振羽根据考古学界对殷墟出土器物和遗迹的考察，从当时的冶炼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出土器物数量的比例，工艺的程度，以及铜器的生产量等方面，说明：“即或那种堆积在窖穴中的石器不是已被废弃的东西，也不可能是主要的劳动工具，在殷代占支配地位的，是人们所拥有的青铜器。”这

---

①该跋后来改作“初版序”，在历次重印本中删除了这部分内容。

②引自《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九五四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59页。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页

样，他发展了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关于殷商“金石并用”的提法，而明确地提出，殷代是“青铜器时代”。

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这一生产力的飞跃，是不是促成了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的性质的变更呢？中国社会是不是一定要到了“铁器时代”才出现阶级和国家呢？吕振羽强调要作具体分析。在世界史的可靠文献上，人类知道用铁最早的古代巴比伦的嘉陀人，是处在容易获得铁矿的有利的地理条件之下。所以，他们从石器的使用直接转入铁器使用的时代。这成了他们在国家形成中的一个特点。恩格斯根据古代中亚细亚以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的史实，对此又加以阐发。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此种情形就是古代一切国家和民族所共同存在的特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又说过，最初的铁，其硬度还不及铜的硬度高。这就启示人们：铜器的普遍使用，照样能创造出相当的，甚至超过铁器初期使用时的生产力。我们考察殷代社会的性质，最雄辩的解释，就是回答青铜器所代表的劳动生产率，能否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从生产领域中脱离出来而成为统治者，也即是否能产生阶级？吕振羽分析了殷代大批存在的“僧侣贵族”、“世俗贵族”，以及脱离生产劳动的公职人员——“诸臣百工”的身份和地位，还有出土器物显示的殷代各种文化成果，说明那个时候劳动生产率已达到这样的程度：直接生产者已经能向社会提供愈益增多的剩余劳动，使财产的积累和私人占有、剥削的出现成为可能。吕的结论是：“殷代的青铜器所代表的生产力，曾创造出存在于社会内部的不劳而食的阶级，易言之，它曾完成了使社会内部的阶的最初的大分裂的任务，而充任了国家出现的主要因素，把中国社会推进到了文明的时代。”

吕振羽的这一研究成果，在当时中国的历史学界是首创性的。尽管它引起了各种人的反对，也没有得到“自己的朋友”的

赞同，但以后的实践表明，殷代是奴隶制社会这一点似乎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公认。今天，我国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对殷代社会的考察和研究，比三十年代已是大大发展了。相形之下，吕振羽当初做的工作自然是粗疏的，甚至包含了难以避免的错误。然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一成绩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表现在这一研究工作中勇于探索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五四”以来新史学的一种优良传统，更应予以赞许和发扬。

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吕振羽还是首倡“西周封建说”的一位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对于西周封建制国家的形成，以及西周初期封建制的确立、发展和演变，所作的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同样也体现了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方面的努力。例如，他很留意周人社会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所发生的渐进演化；同时，又特别关注阶级斗争以致于革命战争引起社会突变过程中的杠杆作用。周人就是通过一系列战争，尤其是公元前1122年的“武王革命”颠覆了殷代奴隶主国家，在其废墟上开始创设封建主义的国家。因此，吕指出：“武王革命”乃是“封建制的历史行程的发轫。”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还应当善于透过假象去发现事物本体，并对其作实质性的分析。吕在叙述西周封建庄园制时，揭开了长期以来被理想化了的“井田制”的谜。他认为，“井田制”早在殷商时代就存在，原本不过是农业经营上一种灌溉制度，包括了“凿井溉田”这样的技术内容。孟轲把西周的这样灌溉制度和庄园的土地制度相混淆，托为封建庄园的土地制度，致使人们沿袭下来，一直当着土地制度去研究。更有甚者，美其名曰：“土地公有制度”。

关于殷周社会的性质，目前历史学界仍存在着不同意见。究

竟中国国家的形成始于何时？具体的道路怎样？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又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的？象这样一些中国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需作更深入的探索和讨论。李达同志在三十年代初曾积极地鼓励和赞助吕振羽同志对中国社会史的研讨。六十年代初，他又曾写信给吕，建议把他的“殷代奴隶制”和“西周封建说”等有关史论加以整理、修订、发展，使之更趋完善，以利于在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可惜，此愿未酬，伴随而来的一场浩劫，使李达同志惨遭迫害致死，吕振羽也被长期剥夺自由，囚禁致残。当年“论战”中，国民党文化特务对进步学者想干而又不愿干的勾当，几十年后居然成了现实。我们回顾吕振羽同志这段治史经历，所感到的教训是很沉痛的。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水平要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必须创造一个真正展开自由讨论、相与争鸣的环境，也必须有日益增多的象吕振羽这样勇于作“探险的尝试”的学者去为之努力。

#### 四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延伸和扩展，涉及到哲学思想史的领域。一九三七年六月，正式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记录了吕振羽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和一段战斗经历。

中国社会思想史是我国封建史学传统所盘踞的一块阵地，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传入后，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流派的反动观点和中国传统的儒学结为同盟。这块阵地又在长时期里为它们所固守。“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的共产主义分子开始发起了对儒学的认真批判，并也不断与传入的各种反动学说有所较量。虽然如此，从整体上看，直至二十年代

末，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仍处于劣势。胡适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等思想史专著，依然有着权威的影响。郭沫若同志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回敬那些侈谈“国故”的夫子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诋诬时，曾疾呼：“然而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但是，在三十年代初，无产阶级这支文化新军尚很幼小，成绩也不显著，而且，又面临着象李季、叶青、陶希圣等这些“思想界的骄子”的严重挑战。他们乔装成马克思主义者，扯起“批判”胡适的招牌，实质继续贩运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他们极力掩盖中国哲学史上各种流派的阶级属性，抹煞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混淆自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资产阶级实验主义、经济主义等唯心论的界限。这些人的目的，无非是在群众，特别是在青年中，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声望，贬低新形成的无产阶级文化生力军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抢夺思想舆论阵地，进而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些人中，影响最大的要算陶希圣。陶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食货》杂志的主编。陶把他在北大讲课的讲义拿出来，于一九三二年五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断断续续出版，定名为《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这部书里，陶声称自己信从“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的变迁必须寻求他们变迁的决定的原因于社会经济构造的变迁”；“社会的变化又与自然界一切现象一样是辩证的。”冒充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事实上，他既不从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变化和社会的阶级关系去说明历史上各种思想及思想家产生的基础，也不阐发这些思想和思想家在社会上所起的进步或反动作用，而只是俯拾各朝代

一些零碎现象和思想家的片言只语，去作生硬的拼凑，编排出一个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即所谓“神权时代”的“神权思想”，“贵族统治时代”的思想，“王权时代”的思想和“民权时代”的思想。敢不敢和陶希圣这些思想界的“权威”较量，并战而胜之，这是摆在当时无产阶级理论战士面前的迫切任务。对此，吕振羽自觉有“一种不可逃避的义务”。为了“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课程下，给中国社会思想的发展以初步的估计，以及从历史上来给予时代以较系统的暗示”<sup>①</sup>，吕就在《中国社会史纲》未完之时，又鼓起勇气，从事哲学史的探索，并选中陶希圣为主要论争对象。在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在这一斗争中吕的良师益友李达同志又给他以启导和支持。

在中国大学任教期间，有一次，李达和吕振羽谈起哲学界的情况。李说：“现在各派别的人都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你要看清楚哪些人是最凶恶的，对准目标，保护马列主义。”吕说：“我想抓住陶希圣。”李说：“对，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御用学者，一个最危险的人物，我们要和他斗争。老弟，你有条件，可以跟他唱对台戏。不过，你对他一面要在理论上、原则上进行斗争，不能让步；一面又不要污辱他的人格，作个人攻击。”在李的鼓励下，吕振羽在中国大学开出中国哲学史的课。为了做到针锋相对，也取名“中国政治思想史”。吕的课引起强烈的反应，北大、清华等校的不少学生也前来听课。为此，陶希圣着了慌。他又是请客，又是托人，要求吕振羽把中大的政治思想史课让给他上。李达听了很生气。他对吕说：“你叫黄松龄回答陶希圣，把他在北大、清华等校教的中国社会史这门课让给你教，叫你统一起来。”陶希圣碰了壁。以后，他又换了花招。他在《食货》杂志

---

<sup>①</sup>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自序”一九三七年六月黎明书局出版。

上发表谈话，虚情假意地奉承吕振羽，说什么：“说到北平图书馆里穷搜苦读，方法与技术兼有修养的人，我还要介绍一位吕振羽先生。……他对于中国社会发达的过程的见解虽与我不同，并对我有严重的批评，但对《食货》的工作，他很热心的。我盼望他以后能够有文字在这小刊物里发表。”借此模糊阵线，笼络人心。对此，吕很生气，就回了他一信。陶将这封信登在《食货》第八期上，冠以《对本刊的批评与贡献》的标题，用它去欺骗和招揽读者。

一九三六年初，为了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少奇同志作为党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通过我党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两同志同南京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谈判国共联合抗日问题。吕振羽同志当时是以进步学者的身份去南京的。一九三六年三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南京谈判期间，吕振羽抽空把中大的讲稿加工整理，仍用《中国政治思想史》之名，交黎明书局印行。在《自序》中，吕说，他仿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编著体裁，“首先把中国史全过程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社会阶段，把每个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之各种阶级及阶层的构成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流派，更把每个流派中各个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当时上海的“不二书店”介绍该书时写道：“此方面的书籍因已极少，而以正确物观方法所写成者，更为绝无仅有。本书作者专攻史学，已往著作贡献已多，早为国内外学者所推崇。本书四十余万言，尤为著者精心杰构，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划时代之著作。”

《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出版，受到广大进步学者和读者的欢迎。人们看到，比之他已出版的两本社会史著作，这本书在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上，

更趋娴熟了，结构也更为严整。他把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各哲学流派思想（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演绎更替，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理出一井然有序的系統，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发展中，自是又一创造性的贡献。这本书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吕后来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还特别问起他这部中国哲学史的写作过程。一九四三年，我党领导的延安“解放社”还重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吕当时曾进行过修改。<sup>①</sup>

因为特定的历史条件的缘故，《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并未出现锋芒犀利的评语，特别还删削了阐述近百年来哲学战线上两军对垒的部分。然而，从它的字里行间，人们依然感受到在那唯心主义狂獗的年代，吕以异军突起的姿态，抨击道统，澄清迷雾的战斗气息。吕本人在书出版时写下的诗篇可以帮助我们领略作者的心境，其中两首这样写道：

破除道统批妖言，思想史程心物分。  
析论阶级穷根本，锋向托陶战斗文。  
手握斧斤探垦深，穷荒原林路可寻。  
浩海茫茫犹未竟，初辟羊肠向高岑。

## 五

一九三七年，抗战全面爆发，吕振羽即受党的指示，迅速回到湖南，在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同志和中共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组织并实际领导了“湖南文化界抗

---

<sup>①</sup>一九四一年和一九五九年，《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曾分别在日本、苏联出版译本。

敌后援会”（简称“文抗）；<sup>①</sup>又和翦伯赞等人办起“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出版《中苏文化》月刊。他经常为该刊撰写专论，陆续发表了《欧局的变化与中国抗战》、《战局的严重关头》、《捷克问题的发展与今后的中国抗战》、《抗战情势讲话》等政论。此外还在湖南其他报刊发表了不少政论性文章。

一九三八年，由吕振羽建议，经徐老（特立）报党中央批准，湖南省委决定派吕在武岗塘田（今邵阳塘田）负责筹办起“塘田战时讲学院”。<sup>②</sup>吕任副院长兼党代表，领导学校工作。这是一所教育革命青年，培养和训练连排级敌后游击战争干部和区乡级地方工作干部的学校，<sup>③</sup>被国民党惊呼为“西南抗大”。吕在这里，编写和讲授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程》。这在吕的治学生涯中，实际上又开设了一个新的门类——中国近现代革命史。自此，直至全国解放后，吕陆续有研究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心得文章发表，还订了独立地撰写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和一部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计划。“塘田战时讲学院”办了一年，后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被三路派兵包围解散。

一九三九年秋，吕振羽接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经由桂林去重庆。到重庆后，恩来同志在接见吕时说：“你来得正好，现在重庆的理论战线战斗很紧张。调你来重庆就是参加战斗。”周恩来要吕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影响，一面搞统战，一面写文章。以

---

<sup>①</sup>这是抗战时期我党领导下全省性的抗日群众团体，也是当时我党在湖南发动抗日群众运动的唯一合法组织，这个组织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为湖南建党准备了条件。七大后，在延安、在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同志领导下曾作过总结。

<sup>②</sup>一九七九年八月，邵阳县革命委员会将“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树立了标志，建立了档案，组成以区、社、队、校为主的文物保护小组。

<sup>③</sup>准备在日寇攻入湖南时，我党单独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在湖南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后，直至皖南事变离重庆，吕都在恩来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配合其武装侵略，驱使它的御用文人，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瓦解。秋泽修二就是其中之一。自一九三七年以来，秋泽连续抛出《东洋哲学史》和《中国社会结构》二书，集中地鼓吹一种所谓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非以外力推动不能前进的反动“外因论”。秋泽的书传入中国后，一批反动的汉奸、托派文人随声附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研究者也误认为“新颖”而常加援引。因此，沉寂过一段的社会史问题“论战”，到三十年代末，又活跃起来，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诸如，中国社会史发展诸阶段的划分、奴隶制时期的具体特点、“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所谓中国社会“停滞性”，关于创造民族新文化等。一九三八年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蒋介石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汪精卫更公开投敌，大搞“曲线救国”。在这种形势下，理论战线上猖獗狂吠的秋泽，以及汉奸史论，就是为日趋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张目的。这也就要求无产阶级的史学工作者站出来，旗帜鲜明地批驳秋泽的史论，痛斥民族投降主义，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而努力。当时的吕振羽自觉到这一点，在刚到重庆后一年的时间里，就连续写出，并在党领导的报刊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度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民族遗产的继承问题》、《本国史研究提纲》等文章。后来，这些文章收入《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一书，一九四二年由上海耕耘出版社刊行。

在这些文章里，吕振羽用层层剥笋的方法，结合中国历史的具体事实，驳斥了秋泽的一系列“歪论”。他指出：“秋泽修二的中国史论，纯系从日本侵华的政治阴谋的基础上，根据预定的宣传观点作出的结论”。秋泽对中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

式”与中国社会的“停滞性”，以及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是明显的机械论，在政治意义上是公然无耻的法西斯侵略主义的一种宣传”。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理论问题。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秋泽用一些含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词句编造了所谓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照他的说法，周以前是“氏族制社会的时代”，“奴隶制到周种族对殷种族的征服后，才成为决定的东西”；自汉至唐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由于北朝时外族的征服，“在隋代，奴隶制又成了重要的生产关系”；到唐玄宗时，中国之所以进入“封建构成的社会”，是因为其时发生过“安史之乱”；“至元代，由于元征服的结果，奴隶制再复活”。就这样，秋泽通过他编造的“一般规律性”，告诉人们懂得，在中国历史发展行程中，新制度的创立和旧制度的复辟，都是由外族的侵入起着决定的作用。吕振羽写道：“依照秋泽修二，异族的‘征服’或侵略，不但是没落阶级的救星，且能替代革命阶级履行革命的任务。”这种说教，应用到日本法西斯侵华的宣传意义上，就是说，“如果中国人民肯欢迎日本帝国主义来征服中华民族，便能‘破坏’‘中国社会特有的停滞性’，给你以‘中国经济的近代化’的道路。”秋泽鼓吹“外因论”的全部动机就在于此。

破是为了立。在揭露秋泽的法西斯史论反动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结合实际，对提出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吕振羽在这方面的努力也是成效显著的。在文集中，他反复着重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基本原理：生产方式规定中国社会的“形势”；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的内在矛盾”；而担当和完成社会“形势”转变的只能是被压迫阶级参加的社会革命。“‘成汤革命’则是实现中国社会由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制过渡的革命；‘武王革命’，在我看来，则是实现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到封建制过渡的

革命。”吕振羽又指出，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社会，包括生产力、生产……以至意识形态，都是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的。中国封建制所经历的时间，较世界上其他国家为长，从而也创造了其时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封建经济和文化。在这过程中，“只有在某种外界的特殊矛盾关系的影响下，在阶级斗争或阶级压迫、剥削政策特别残酷的影响下，人民不只无法扩大再生产，甚至不能照常进行生产的情况下，才可能促成或阻滞社会的前进发展速度以至引起暂时的倒退”，而绝非秋泽所谓“亚细亚的停滞性”。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则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严重地阻滞和歪曲了发展的过程”。因之，民族民主革命就为近代中国社会之必要和必然。这一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担负革命任务的，是‘共同奋斗’的全民族各革命阶级阶层，并只能以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为领导。”对秋泽的批判，是在新形势下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吕的这些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的称赞和鼓励。在吕的带动下，当时在重庆的一些史学工作者也投入了这一战斗。

在这本文集中，吕振羽还简略地追述了自二十年代末以来国内开展社会史研讨的历程。他指出，在十余年中，“旧问题不断地获得解决，新问题不断地被提出，这正是中国文化运动发展过程的辩证法，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即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进程的反映——不但适应着革命的实践要求而为其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在其指导下进行的。”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不是经院式的空谈，或“单从理论宝库中搬弄文句”所能济事的；只有“从历史自身的具体内容上，从人类的实践中，先进阶级和其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实践中，才能得出和考验正确的结论，确证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正是在不断解决实践提出的历史问题并又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日益发展和壮大了起

来。在这里，吕振羽又一次表彰了郭沫若同志对新史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郭沫若不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首次提出中国社会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应用科学的方法，进行中国史资料的整理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吕指出：“我以为郭先生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功绩，不在于其见解是否完全正确，而在于他首先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中国史，其开创的功绩，是不能否认的。”人们知道，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一些具体论点是与郭沫若有分歧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有不同学派的话，那么，吕、郭正是两个流派的代表性人物。而且，批评和争鸣还在进行，远未能做到统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吕能够对于郭在中国新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公正而恰当的评价，足见其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和谦逊精神。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内部一种新型的道德风貌和同志关系。

此外，文集还讨论了中国社会史上奴隶制时期的若干问题，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吸收世界文化进步成果问题；在后一问题上，吕着重宣传了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系列光辉思想。总的说起来，《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是在中国革命进入全面抗战的新时期，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文化斗争的战果汇集，属于“为‘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服务的新史学”的一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为了争取它和读者见面，曾经对若干问题的论断采用了转弯抹角的笔法，也采用了一些较晦涩的词汇”，但是，它的战斗作用和在读者的反应仍是强烈的。

就在这同时，吕振羽和江明同志又从事着另一项更加巨大的工程——《简明中国通史》的编著。

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对吕振羽同志说：“现在蒋介石搞尊孔读经，毒害青年，你可以写一本中国历史，从正面教育青年，和蒋介石作斗争。”吕毫不犹豫地接受党交给的这一政治任务。他

在复旦大学任教之余，在江明同志的协助下，全力奋战，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写出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学习和普通读者阅读的《简明中国通史》前八章，作为第一分册，交“生活书店”，五月在香港出版。这年五月，在延安的“中国历史研究会”以范文澜同志为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也完成了上册，于一九四二年出版。这样，在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保存力量，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又决定让吕振羽同志和江明同志自重庆转移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行前，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中旬某夜，吕振羽到曾家岩五十号辞别周恩来同志。当时形势险恶，吕此行需穿越特务横行的国民党统治区，经香港和日寇严密防范的上海，才能进入我苏北根据地。周恩来同志对沿途安全极为关怀，作了周密详尽的安排和指示。时已深夜，他留吕过夜，催吕睡下，自己才离开。不久，周恩来同志想起还有事要叮嘱，又回到吕的卧处。吕要起床，他将吕按下，自己站在床前和吕谈话。吕思绪万端。日后曾纪以诗：

真美人间马列心，周详恳切意高深。  
床前形象窗前月，寸草涓埃报好音！

多年来，吕每一念及，周恩来同志崇高的形象如在眼前！

由于工作的转移，写著《简明中国通史》的工作也暂告中断。当时，吕带着负疚的心情写道：

稿才半卷离渝城，未完党命心难平。  
我负国区菁菁子，投笔善事戎马行。

到苏北后，吕化名柳岗，在中共华中局高级党校任教，曾编写《中国革命史讲授提纲》、《中国社会史问题十讲》、《中国哲学史问题十讲》。

一九四二年初，吕振羽随少奇同志回延安，任少奇同志政治秘书。这是一次穿越敌后、万里夜行军的长征。（振羽、江明同志在《跟随少奇同志回延安》的回忆录中已有所叙述。）一九四三年底回到延安后，吕任少奇同志的学习秘书。这期间，《解放日报》曾连载吕所著的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短论《中国历史常识讲话》多篇。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吕又愤然命笔，写著了《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以“专论”刊载。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后，我大军进入东北，振羽自延安出发东北，到达冀热辽，奉中央电示：由李运昌、欧阳钦、吕振羽三同志组成“冀热辽救济分会”领导小组。一九四六年，中共冀热辽分局派吕去北平，协助“三人小组”的“救总”（我解放区救济总会）代表伍云甫同志与“联总”（联合国救济总署）、“行总”（即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进行谈判。一九四七年，党派吕去国统区湖南。因交通梗阻，加之有病，吕和江明同志不得不改在东北停留。就在大连候交通和养病期间，吕振羽和江明又协力编著，至一九四八年二月，完成《简明中国通史》后半部的初稿，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第二年，该书分两册，由“三联书店”出版。

《简明中国通史》著于戎马倥偬的年代，断而复续，时历八载，条件是相当困难的。据作者自述，最后在大连、“连二十五史及年表之类的书也找不到手，仅能凭日文材料和极少数的中文书籍作参考<sup>①</sup>。”初稿写成后，尚来不及复写和修改，又奉调他处工作。因此，“粗枝大叶，以至错误，在所难免。”然而，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著作，不论是理论观点，还是编纂体例、方法，它都是区别以往、开导未来的一个新标志。吕振羽

<sup>①</sup>见《光明日报》一九五〇年九月三日星期增刊“附：吕振羽先生来函”。

在初版序中说：“我的写法与从来的通史著作颇多不同。最重要的：第一，我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把握；第二，我注重于历史的具体性，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第三，我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渗入。不论我是否达成了这个愿望，但我认为应该以此作为写通史的基本观点。”在一九四八年的“完稿序”中，又说：“我的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的确，这种“基本观点”和“基本精神”贯穿全书，加上自三十年代初以来他在中国社会史的研讨中逐步地构建和完善了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中国史体系，因此，该书在历史学的发展上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简明中国通史》全书出版不久，柴德赓曾就书在年代、地理、人名、事实等方面的具体错误中肯地提出了批评和纠正。同时，柴也正确地指出：“用新的观点方法写一部中国通史，是目前一件极迫切需要的工作，当然也是很困难的工作。直到今天，象这样的通史，还只有本书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这两部书在现阶段确实给治史者以新的启示，指示了新史学的方向，是很有功于历史教学的。”①

一九四〇年，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②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了我们党需要迫切回答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从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纲领等方面解决了这个问题。郭沫若、吕振羽、范文

---

①柴德赓《对吕著简明中国通史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一九五〇年九月三日“星期增刊”。

②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55页。

澜等同志，则是通过历史学著述，从中国社会史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中华民族的前途，树立起人民必胜的信心。《简明中国通史》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

## 六

抗战胜利后，吕振羽还撰写了一本《中国民族简史》，一九四七年二月，在哈尔滨完稿。第二年，由“三联书店”（大连光华）出版，一九五一年增订再版。

吕振羽为什么要写这部书？他个人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回答了这一问题。

原来，吕的曾祖父是一个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大旗手。运动失败后，他沿途乞讨，从福建间关逃回了家乡，闭户潜居，以打草鞋谋生。在他参加太平天国起义军以前，日子就过得很艰难，娶不起亲，眼看只得打一辈子光棍。从吕家西望，就是岗峦起伏、万山绵亘的瑶山，山上的少数民族，常有带着山货下来做交易的，人们都叫他们“苗子”或“瑶子”。一天，一个瑶族老人沿门卖药，身边带着一个姑娘，说是谁能给一点钱，就让她跟去，寻一条活路。吕的曾祖父就凑了八百铜钱，买下了这个姑娘。她后来就是吕振羽的曾祖母。曾祖母本无姓氏，因怕受人歧视，就冒姓肖。直至吕振羽小时候，还常被人骂作“苗子崽崽”（当地苗瑶不分）。同样是人，为什么瑶族的后代就被瞧不起呢？在吕振羽幼小的心灵里，便产生了对民族歧视的反感。上学后，见到书上将少数民族名称都加上“犬”旁或“虫”部，如“瑶”、“蛮”等等。他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是极端不公平的。通过对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吕逐渐懂得，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歧视和不平等，原

来自古有之，源远流长。尤其在封建社会，儒家的正统观念和大民族主义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即使是到了近代，一批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充其量还只唱出“五族共和”的调子。在他们的眼里，依旧没有那些弱小民族的地位。其实，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对创造祖国的历史都作出过贡献。单从中国历史上曾风云一时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来看，查一查他们的籍贯，就能列出十几、甚至几十个族别。在清朝专制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的旧中国，全国是一座大监狱，处于边远地区的弱小民族的劳动人民是在监狱的最底层。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责任，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当中，自然也包含了批判封建主义正统观念和大民族主义，恢复各族在历史上的应有地位。

参加革命以后，吕振羽的觉悟又提高了一步，他认识到，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实际上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一个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主要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求得国家的独立；同时，也有一个团结国内各族人民，消灭民族压迫、剥削，实现各民族平等，建立一个和睦大家庭的问题。民族问题上的反帝任务为大家所知晓，可是国内的民族问题，却并非革命队伍内部所有人都熟悉。抗战以来，党为了团结国内一切爱国力量，组织和发展最广泛的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为了有效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愈益重视民族问题和工作。客观形势也就要求历史学者为此作出相应的努力。

实际上，抗战以来，不少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民族学”、“民俗学”的“学者”纷纷深入我国内地和边疆，搞所谓“科学考察”、“社会调查”。他们的目的在于歪曲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质，为侵华政策提供历史根据。蒋介石为了策划反共高潮，实行法西

斯统治，也指使他的御用学者著书立说，在民族问题上重弹封建主义滥调。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的，由陶希圣执笔，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就贩卖希特勒的优生学，宣扬血统论，竭力抹煞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他们说什么中国各民族统统是“炎黄子孙”，汉族是“正统”，其他各族是“宗支”或“宗族”。这就告诫人们，民族学和民族史是社会科学领域内又一个十分重要的阵地。对此，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工作者绝不可漠然置之。在革命队伍里，吕振羽接触到许多民族的优秀分子，更鼓励他去研究各民族的历史，考索各民族的起源和发展，说明汉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尤其阐述各民族人民为追求进步、解放而斗争的光荣传统，用事实粉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的无耻澜言。抗战胜利以后，形势发展很快，一方面，蒋介石在美帝的支持和怂恿下，妄图发动内战，全面实施其卖国、独裁的法西斯专政；一方面，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强大，依靠各条战线的斗争，在不长的时间内，完全可以创立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正在这两种命运决战，各族人民翘首企望新中国诞生的日子里，吕振羽要写各民族简史的愿望更强烈了。

在当时，靠一个人的努力，写成一部中国民族史是难以想象的。首先碰到的是历史资料奇缺。能搜集的文献和有关专著极其有限，而且由于著作者的阶级偏见，其中带有相当多的谬误。对于这一点，吕振羽有很深的感触。他说：“我自己在过去的一些著作中，由于实际生活的不够，常不免为人家书本的虚伪与片面材料所蒙蔽，而构成一些不切实际的乃至错误的论断。”针对这种情况，吕振羽认为，有必要将研究方法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应从单凭书本等死材料出发的方向，转入实地调查研究和具体斗争的方向，掌握活的情况，获取活的材料。”这样，吕自到延安后，便留心在工作和行动中作实地接触和调查，采访身历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同志；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在冀热辽负责救济分会和

中共冀热辽分局巡视团的工作，深入基层，直接接触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从经济、政治、语言、民俗、生活和历史传统等方面，了解了不少情况，积累了不少材料。在这样的基础上，经较短时间的编写，终于完成一本简史。吕在初版序中说，中国国内民族问题，客观上已迫切需要解决，但人们对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还相当隔膜。“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各民族的研究，大都从侵略主义的观点出发；国内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则大都从大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御用的著作，尤其是‘陶希圣校对’的《中国之命运》，便不过是封建买办法西斯大民族主义的扯谎宣传，是其对中国各民族和人民的挑战。……因此，我写这本小册子——《中国民族简史》稿，由于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虽有不少缺点；但把它印出来，提供给工作者和研究者作参考，我们以为不是全无意义的。”这本简史对汉、满、蒙、回、藏、维等族的历史和现状作了铺叙，突出了各族人民的斗争传统。现在看来，内容尽管是片断的，且还存有错误，但从作者自述的角度去评判，该书的战斗风格和现实意义仍很显然，它作为一般干部的读物，较好地起到了普及民族史知识的作用。在当时，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族史作研究，吕振羽同志确是作了一个开创性的尝试，为后来的历史编著走出了一条新路。

全国解放后，吕振羽同志曾担任民委的工作，一九五七年他出席了在青岛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说：“今天有吕振羽同志在场，他知道的比我清楚。我很希望我们的历史学家讲一讲中国民族的发展史，可以更加证明我们民族的交插时代很多。”又说：“象吕振羽同志这样的作家，我倒是希望他能多写一点。”这对于吕，无疑是一极大的鞭策和鼓励。

从此以后，吕更加注意民族史的研究，写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特点》、《关于历史上民族融合问题》、《从远古的文

化遗存看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我国若干少数民族原始公社制或其残余》、《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再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等一批论文。其中有的文章为有关国家的政治和学术界所重视，曾加以转载。民族史是吕振羽在全国解放后史学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成绩是显著的。

## 七

一九四八年以来吕振羽同志先后担任辽东省委、东北人民政府、大连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央民委的领导职务，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一九六三年初，吕遭受迫害，失去自由。在这之前的十三年，吕振羽在工作之余，甚至身患重病的日子里，写下历史研究论文七十多篇，包括社会史、思想史、民族史和史学方法论等内容，其中主要文章收入“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的《史学研究论文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六篇）和“三联书店”出的《史论集》（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〇年十二篇）。此外，这十三年，吕也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工作，对党内干部开设中国史讲座，著有中国历史讲稿等。失去自由后，吕振羽仍顽强地战斗着。他在阅读了马列原著和有限的报刊之后，写下约二十多万字的“史学评论”，还利用废报纸作稿笺，整理了《学吟诗草》十卷计三千首，其中有“咏史百题”、“祖国颂”等。一九六四年春节，吕振羽病体初复。他渴望早日结束“审查”，以便重返史坛，修订旧著，开辟新篇。于是，伏案试笔，作述怀四首，其中一首说：

脑力衰颓羨岁华，倔强犹欲看锥花。  
近今史事须雕琢，往旧吟哦待选拔；

民族余编胸有数，哲人补述尚多家。

卅年假我殷勤学，夫妇同窗感不殊。

遗憾的是，事拂人愿。因刘少奇同志冤案株连，一九六七年一月，又锒铛入狱，直至一九七五年初经邓小平同志批示获释。十二年的幽禁生活象恶魔一样，不仅摧残了他的身体，也吞噬了他治学的宏愿。这对一个半辈子经历过风云激荡而现在刚刚有了安定平静的治学环境的史学家来说，无疑意味着其研究生涯被人为地中断了。这该是多么痛心的事啊！

吕振羽同志治史五十年，他著述的旺盛期集中在前二十年，也即从三十岁到五十岁。在这二十年中，除编写讲义、发表史论和政论外，他的历史学论著共八部，二百余万字。这些论著是他一生治史的代表作，解放后大部分多次修订、再版，显示其影响历久而不衰。这些论著既凝聚了他的心血，也深深印下了他走过的足迹。

这足迹，是从经济史，而社会史，而思想史，而民族史，而通史，一步步深入的足迹。

这足迹，是从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而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步步攀登的足迹。

这足迹，不仅是他治学的足迹，也是他人生的足迹，是他参加革命，进行战斗的足迹。

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的足迹！

这些足迹将启发我们后辈：你将如何去继续前辈们没有走完的途程？

古史有“履巨人迹”而生太昊、生弃的神话，我们今天却需要踏着前辈的足迹，去创造一个史学繁荣的新时代。

一九八〇、六、十九完稿